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的 泛起还是精英政治的危机?

许振洲

内容提要 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已延烧至今,短期内仍无平息迹象。学界对其评价不一,但经常将其与1968年“五月风暴”类比。本文认为,“黄马甲运动”反映的似乎不是法国民粹主义的泛起,而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作为这个制度支柱的各传统政党、工会、主流媒体等政治中介物,未能及时体察民意、整合民意、将民众的诉求引导到正常的代议制机制中进行回应处理,而是一如它们在“五月风暴”中的作为,游离在运动之外,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政治功能。“黄马甲运动”是否标志着法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乃至替代,仍有待观察。

关键词 世界政治 法国 “黄马甲运动” “五月风暴” 代议制民主 政治功能 精英政治 民粹主义

爆发于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到本文截稿时已延续了52周,其间经历了圣诞节、新年、特别是法国人视为神圣的暑假而坚持

*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政编码:100871)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不辍。笔者认为在短期内仍看不到它平息的迹象。从第一场(acte I)的28万人,到最为引人注目的2018年12月1日第三场的袭击凯旋门,到当下表面上的不温不火,参加人数确有下降趋势。但每逢周六,“黄马甲们”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各个城市特别是巴黎的大街上,表达他们的诉求。人们无法确定它是否会在某一天借某一契机重拾前几场的势头——法国政治中似乎最不缺少这种契机。但哪怕它现在就宣告结束,“黄马甲们”也仍然足以自傲了: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政治——社会运动坚持如此长的时间。即使是为人津津乐道的1968年“五月风暴”,其直接寿命也不到两个月。

本文希望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这场运动的缘由与意义,并进而探讨法国代议制民主体制面临的危机及可能出路。

一、“黄马甲运动”始末

“黄马甲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燃油税。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减少石化能源的消费量,也是为了搭便车扩大财源,法国政府计划从2019年元旦起提高燃油税:每升柴油加征7.6%,每升汽油加征3.9%。而在2018年,由于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法国的柴油、汽油价格已分别上涨了23%和15%。^①需要稍加解释的背景是,在法国,汽车是工作与生活的必需品,每天为上下班而开100公里是经常的事。柴油车由于油耗低、动力足、寿命长,再加上过去的柴油价格远低于汽油而备受欢迎,对于需要跑长途的人来讲尤其如此。在最高值的2012年,法国柴油车的保有量达到了73%。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一般民众的收入增长幅度不大,不少家庭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甚至步入贫困。

虽然有种种征兆和预警,^②但马克龙—菲利普政府显然没有估计到多数民众对这个法案的反感程度,在运动初起的两周多时间里又没有及时与社会各

^① 2018年11月法国的柴油价格约为每升1.49欧元(其中成本只占0.48欧元),95号汽油价格约为每升1.52欧元。如按新税率征税,则每升柴油价格将上涨11生丁,每升汽油上涨6生丁。

^② 2018年10月21日,《巴黎人报》网站上刊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中止燃油税计划。三天后,该请愿书便得到30万人的联署。又过了几天,联署人数超过了100万。2018年11月6日,马克龙在凡尔登市政府前与一对退休夫妇对话时,后者说道:“我们已经不再信任您了。您看到了愤怒情绪在整个法国的蔓延吗?11月17日,咱们走着瞧……您太年轻了,您没有经历过五月风暴。”参见[法]塞西尔·阿马尔、西里尔·格拉兹亚尼:《人民与总统》,巴黎:米歇尔·拉丰出版社2019年版(Cécile Amar et Cyril Graziani, *Le peuple et le Président*, Paris, Michel Lafon, 2019, pp. 10-11)——本书标题的隐意便是二者的对立。

界沟通协商。这直接导致了第三场的攻陷凯旋门及香榭丽舍大街。^①

在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后，政府的反应按一般标准并不算慢。2018年12月5日，菲利普总理承认，无论什么税也不值得危及国家的团结。因此，他准备在六个月内冻结燃油税，并在2019年5月前维持电价的稳定。^②

马克龙此时已很清楚，简单的冻结(moratoire, 延期支付, 是一个只有技术官僚使用的生僻词, 为“黄马甲们”所不理解)是不够的。为了稳定政权及争取民心, 不如直接取消这个法案。2018年12月10日, 他在向全国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更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利好政策: 2019年起, 在不增加雇主负担的前提下, 最低工资每月调高100欧元; 加班收入不再征税; 雇主给自己的雇员发放的年终奖也不再征税……这些许诺将每年花费100亿欧元, 并使法国突破欧盟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的刚性规定。此后不久, 他又提出从2019年1月15日至3月15日, 在全国范围内就“税务和公共开支、国家机制和国营企业、生态转型、民主和公民资格”四大主题展开“大辩论”, 希望形成多数公民的共识。

然而, 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真正平息群众的怒火。在大辩论结束后的第二天, 第18场游行再次演变为暴力冲突。“黄马甲们”的口号已不再是取消燃油税, 而是扩展到对现行政治、社会体制的广泛质疑。平心而论, 现在没有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能够满足这些诉求。马克龙能够做的也只是等待, 等待这场运动动力的自然衰减, 等待“黄马甲们”热情的逐渐消退。没有人知道在等待之中会发生什么意外。回过头来看, 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其实是2018年11月17日第一场“黄马甲运动”之前。但当时谁又能未卜先知呢?

以上背景和过程已为世人熟知。但笔者还是希望在此做一些补充性的观察。

第一, 如何分析“黄马甲们”的社会构成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一群极左或极右分子, 或是种族主义者、排外分子吗? 答曰基本不是。无可否认, 运动中先参加进来的有若干极右派, 后来又有极左派的介入。大部分暴力事件的肇事者除了那些近于职业化、利用一切游行示威来发泄不满的打砸抢者(les casseurs)外, 基本是这些极端分子。但是, “黄马甲”中的主流是那些最低工资领

① “妈妈, 我现在知道什么是革命了。”——祖孙三代示威者中的小女孩向她妈妈说的话。Op. cit., p. 36.

② 诛心的话是, 欧洲议会选举将在2019年5月举行。

取者、非全职工作者、社会救助金受益者、退休者,还包括相当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乃至小型企业的经营者。用最简单直接,但绝对符合学术标准的定义讲,这便是人民。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亲身体会到法国经济的不振及生活水平下降。许多人的月收入在1000欧元上下,以此支撑整个家庭的支出。境况最窘迫者甚至沦落到无力添置衣物、临近发放工资的日子时一天只能吃一个三明治的地步。^①他们并不是像某些精英们(如马克龙总统说的所谓跨过这条街便能找到一份工作)污名化的一群拒绝劳动、只指望社会救助的懒汉。有的人找不到工作而成为失业者。更多的人工作,赚取自己的工资,但这份工资不再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有尊严的生活”。^②他们沮丧、失望、愤怒,因而成为“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或同情者。这些人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政治派别;他们中的多数希望这场运动是非政治性的;他们的口号和旗帜并未自外于共和国。

他们之中绝少移民。运动中也基本没有反对非法移民乃至排外的声音。

第二,如何评估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其实,在50多场示威中,真正发生较大规模的纵火、洗劫商店等骚乱的周六不到1/10。何况这些骚乱大多发生在巴黎,其他城市中的暴力现象则少得多。在运动的高潮期,很多“黄马甲”并没有参加城市里的游行,而是活跃在公路上的各个环岛、各个收费站,设置路障,更谈不上什么暴力行为。法国社会对“黄马甲运动”的普遍同情证明了上述判断:在运动的第一个月里,法国人民对它的支持度超过了70%。“黄马甲们”在环岛、收费站旁边搭起帐篷、点起篝火,度过寒冬的夜晚。附近的居民则像拥军支前一样纷纷给他们送去食物与生活用品。在圣诞节前,弗雷瑞斯市(Fréjus)的“黄马甲们”甚至收到了与赫本同时代的传奇影星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送来的一大瓶酒和鲜花——“献给我的黄马甲朋友”。

或是出于隐含的价值取向,或是出于吸引受众的职业需要,传统主流媒体更喜欢报道那些戏剧性强的场景,这也是“黄马甲们”普遍对主流媒体反感乃至敌视的主要原因。“目前专业记者遭遇的信任危机来自于这个职业的固有矛盾。在报道社会运动时,为了吸引受众,媒体的主流倾向于渲染暴力场面。

^① 2018年8月中旬起在日内瓦万国宫前绝食抗议的“小让”(Petit Jean)每月只有500欧元的救助金。

^② 1946年4月19日颁布的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在其前言《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按照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传统,宪法前言便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破天荒地增加了“社会与经济权利”条款。其中第28条明确规定:“根据他们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男子和妇女在任何条件下均有权得到公平的报酬,得到使他们自己及家庭有尊严地生活的手段。”又如第24条的规定:“国家保障使家庭得到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个宣言中,“有尊严地生活”多次出现。它构成了战后法国社会共识的法理基础,代表了现代法国以及西欧北欧国家的普遍意识形态或曰“模式”,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及号召力。

这自然会引引起运动参加者的不满。这种不满使得他们中一小部分倾向于忠实报道的同行的工作黯然失色。”^①好在现在出现了许多业余媒体人。他们的设备一般，更谈不上什么拍摄技巧，经常只是几个小时不间断、无剪辑地播放游行实况。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例如，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是一位“黄马甲”挥动着三色旗，前面是一片火光，后面是烟雾弥漫的凯旋门。乍一看，巴黎仿佛已经成为了战区。但实际情况是，黄马甲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中央用木制包装箱条点了一堆火，其中一位在火堆后面挥舞国旗。这个地方离凯旋门至少还有几百米。两辆警方的水炮车淡定地在火堆旁驶过，无暇或不屑于用一两秒钟去扑灭它。至于香榭丽舍大街及凯旋门上空弥漫的狼烟和一道道飞舞的灰线，更与示威者基本无关，而是警方发射的催泪瓦斯和震撼弹所致。

一位前业余拳击冠军隔着盾牌痛殴警察，后者伤得不轻。^②这一视频也得到广泛传播。但根据统计数字，到目前为止，游行示威中共有两千多人受伤，^③其中绝大多数是“黄马甲”。例如，运动的第一天，根据法国内政部的统计，“黄马甲”中有 388 人受伤，其中 12 人重伤。警方则有 15 人轻伤，1 人重伤。这点并不难理解：警方（警察、宪兵、共和国保安队 CRS）与示威者们的装备水平实在是天壤之别。“黄马甲们”的终极武器也不过是法国二百多年来革命或骚动的经典道具铺路石，而警方除了水炮车外，有警棍、催泪弹发射器、瓦斯喷桶、震撼弹，甚至是被内政部长称为防御性武器的内装 25 克 TNT 及催泪瓦斯的 GLI-F4 型手榴弹。^④在防御手段方面，示威者只有头巾或面罩。警员们则是武装到牙齿：头盔、护面、防毒面具、胸甲、硬质护肩护肘护膝……一般情况下，即使倒霉到被铺路石直接命中，也多无大碍。据说倒是在运动中期有人发明的“污物鸡尾酒”(coketail cacatov)^⑤——用塑料袋装的屎尿及其他污物——对他们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感到了屈辱。

① [法]杰拉德·努瓦亥依：《历史视角下的黄马甲》，巴黎：《世界报》/黎明出版社 2019 年版（Gérard Noireil, *Les Gilets jaunes à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 Paris, Le Monde/Éditions de l'Aube, 2019. p. 88）。

② 拳击手受到了“黄马甲们”的普遍谴责，也很快被送上了法庭。

③ 运动中已有 11 人遇难。其中 80 岁的马赛市民泽内贝·勒杜内（Zeneb Redouane）夫人死于警方扔进她家的烟雾弹。另外 10 人与游行示威无关，而是由于没能看清或及时躲避公路上的路障。死者中既有驾车者，也有“黄马甲”。

④ 这种防御性武器致使两位示威者摘除了眼球，一位接受了颌面整形手术。

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军燃烧瓶俗称“莫洛托夫鸡尾酒”(Coketail Molotov)，法国儿童用语将大便称为“caca”。

直播视频还显示出,警方干涉的对象、时机及强度也未必总是无可非议。在2018年11月24日的第二场“黄马甲运动”中,一对退休的示威者靠近共和国保安队的隔离线,对保安队员说:“‘我们在捍卫这个国家。我们也是为了你们而来。你们也会有孙子孙女的。’一个保安队员用盾牌推搡老奶奶,另一个用瓦斯喷老爷爷。周围的人们被激怒了。本来在和平示威的他们开始攻击保安队员。”^①

因此,从总体来看,“黄马甲运动”的基色不是暴力,参加者的主流也不是打砸抢分子,尽管其间确实有暴力的片段。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学家杰拉德·努瓦亥依特别指出,“内政部长重新拾起了右派政权的老伎俩,千方百计地夸大事态的严重性。甚至说有些示威者想要‘杀掉’警察……而‘黄马甲们’砸碎香榭丽舍大街上奢侈品店的橱窗,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种戏剧性手段来表达他们对令人发指的社会不公正的不满”。^②

第三,“黄马甲运动”延烧的原因。既然政府已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宣布取消了加征燃油税的法案,甚至主动释出了一些额外的善意;既然引发这场运动的直接原因已被排除,示威者们的第一诉求已得到满足,为何“黄马甲运动”会迁延至今?答案很简单:燃油税只是运动的由头。它的真正根源是上文提及的法国下层阶级普遍的绝望、不满与愤怒。法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法国人酷爱平等,因此,不可避免地对于各种差别十分敏感、难以容忍,乃至带有为许多精英所痛诋的“仇富”情结。^③他们热衷于游行、罢工、改革乃至革命,善于以此展示自己的力量并经常赢得胜利。这次,当导火索被拔除后,黄马甲们迅速开始考虑其他问题。他们关心的不再是燃油税,甚至也不只限于提高最低工资或恢复奥朗德政府设立而被马克龙取消的巨额财产税(ISF),而是呼吁罗尔斯式的社会公正、社会正义。在政治方面,要求马克龙下台之外,^④还希望弥补“民主赤字”,设立“公民动议公投”(référendum

① Cécile Amar et Cyril Graziani, *Le peuple et le Président*, p. 65.

② Gérard Noireil, *Les Gilets jaunes à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 pp. 110-111. 作者甚至将其比喻为当年巴黎公社拆除旺多姆广场上的纪念碑,并指出凯旋门只不过是拿破仑牺牲了100万法国人生命所取得的“胜利”的象征,与共和国毫无关系。

③ 与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风气比,法国的富人其实是相当低调的。不张扬(Discret)是上层社会中为人称道的行事风格。

④ “马克龙辞职!”(Macron, démission!)的口号在示威者中不胫而走,合辙押韵,朗朗上口。

d'initiative citoyenne, RIC)制度;^①或是改变国民议会的选举方式:将现行的小选区单记名二轮多数制改为一半选举、一半抓阄;甚至干脆在国民议会、参议院外再设一真正代表下层利益的人民院……。

这不是专业、常规的政治运作,因为它让对方无从回应。理性的做法应当是提出有限的、具体的诉求如增加工资、减轻对低收入者的税赋等,然后展开博弈。政府如果希望让步,也具有可操作性。但社会正义的内容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即使某一天公民动议公投梦想成真,甚至国民议会议员真的有一半由抓阄产生,抽象笼统的社会正义恐怕也仍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政治原则。

因此,真正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分析的,倒毋宁是这场运动的政治意义与思想内涵。

二、平民与精英的政治联姻:政党

“黄马甲运动”给我们带来的震动或其政治意义,是它标志着法国的代议制民主在整体制度上出现了危机;传统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失去了影响力,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尤其是不能再正常发挥其政治功能,代表民意,引导民意。

众所周知,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与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雅典民主的主要特征中有两条与我们的话题直接相关:(1)城邦的重大事务在全体公民均可参加的公民大会中依多数原则决定,即权力属于公民;(2)绝大多数官职由抓阄产生,且任期较短,轮换频繁。每个公民都有机会直接行使权力,参加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这意味着权力行使的非专业性。^②这些特征的背后,隐含着民主的真正精神:平等,或更加确切地说,公民在政治机会、政治权利方面的平等,是典型的“民有”与“民治”。

现代民主则与这种直接制民主不同,是一种代议制民主:一方面,承认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公民—这是制度的理论基石,经典的阐述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另一方面,公民并不直接行使这个权力,而是将它委托给了经选举产生的代表—这是制度的运行模式,为人熟知的表达是密尔的定义:“代议制政体

^① 公民投票(referendum)在法国悠久的历史,20世纪末以来次数更有所增加,但仍然基本是一种政治精英动议、人民批准的决策机制。而“公民动议公投”(RIC)的实质则是将精英们抛在一边。

^②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①或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三条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及公民投票对其加以行使”。我们看到,现代民主强调的仍然是“民有”,但“民治”则是经由自己的代表加以实现的。普遍选举因而成为了现代民主的核心环节与关键特征。熊彼特的定义仍值得重温:“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②

相对于王朝政治,代议制民主的实施当然可以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但其中因袭之处正也不少: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精英政治,只不过是经过民众批准、选择的精英制,或者说是一种精英—民主的混合政体。因此,它并没有改变政治即权力的本质,统治/被统治、支配/被支配的权力现象仍得以维持。对这一点,20世纪初的若干现实主义政治学家已做了深刻的分析。莫斯卡通过对历史的细致观察,得出下列结论: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必然会走向组织,其最高阶段便是国家。而一旦有了国家、有了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个“统治阶级”。这一基本事实并不因现代民主制的出现而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在所有达到一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中,政治控制在该术语最广泛的意义上(行政的、军事的、宗教的、经济的和道德的领导权),总是由特殊的阶级、或被有组织的少数人行使。”^③而“在其他政府形式中发生的情况,也就是有组织的少数人施加其意志于无组织的大多数人,也完全会在代议体制下发生,并被发展到极限”。^④

随着普选权的逐步实现,政治组织、政党也登上了历史舞台。现代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有没有政党,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根本区别。^⑤许多学者认为,抽象而原子化的人民甚至无法充分体认自己的利益所在,更不用说在政治博弈中取得发言权。而这便是政党及专业性的政治家的使命,即

① [英]斯图亚特·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页。

②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③ [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④ 同上书,第212页。对这一观点在新形势下的发挥,亦可见[南]米洛万·吉拉斯:《新阶级》,巴黎:普隆出版社1957年版(Milovan Djilas: *La Nouvelle Classe Dirigeante*, Paris, Plon, 1957)。

⑤ [法]雷蒙·阿隆:《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巴黎:口袋丛书出版社1977年版(R.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Pluriel”, 1977)。

不仅是在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集中选票，取得执政权，更在于了解民意、整合民意、表达民意。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也因此增加了第四条：“政党及政治组织协助选民意愿的表达。”

政党领袖是典型意义上的精英。对这一点，一个世纪之前的米歇尔斯已做了精到的研究。他指出，抽象的人民永远无法进行统治，所以只得依赖政治组织特别是政党。没有组织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但一切政党，哪怕是当时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精英倾向，沦为寡头组织、寡头统治，最终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造成民主的衰落，即所谓“寡头统治铁律”。“除非在选举期间，保守派政党常常总是趋于寡头化，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标的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也丝毫不亚于保守派政党。”^①“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赋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②一句话，由于统治阶级对权力的不断篡夺，理论上的民主必定会逐渐演变为实践中的贵族政治、寡头政治。

当然，托克维尔总是见识高人一筹。他脱离了对某一特定政体形式的偏爱乃至迷信，而更关注政治的根本目标：自由与良治，特别是探讨了次级权力即政治中介团体在实现这些目标中的作用。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指出大革命的起因之一固然是第三等级对贵族领主所享受特权的痛恨。但这种特权由来已久，为何在18世纪末变得如此无法令人容忍？为何英国贵族的命运迥异？他分析道，在封建社会中，法国贵族一方面享有特权，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封地实行着治理，维持着领地内的地方生活、人民的内聚力^③乃至相对于王权的一定自由。此时“人们看待贵族近似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所以“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④用现代的语言讲，虽然贵族阶级招人嫉恨，但因为它在行使着若干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功能，与地方自由一起形成了王权与人民之间的次级权力或政治中介，所

①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第28页。

③ “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他的领地内的穷人，须由他来赈济。”[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1页。

④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1—72页。

以便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贵族管理地方的职能日益被中央政权所取代。而这个已失去了其功能的贵族阶级又仍然享受着传统特权,于是才引发了平民的怒火。^①不过,大革命带来的不一定是政治自由。贵族阶级的权利及地方自治的传统以不平等的理由被取缔了,而新的次级权力又未能及时建立。中央集权终于被推进到了高峰。“在我们这个时代相继从某些阶级、团体和个人手里夺过来的各种权利并未用去在更为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次级政权,而是全部集中到国家元首手里。”^②这时,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次级权力机构,因而在它和个人之间只剩下了广阔空旷的空间。对个人来讲,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构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在他看来,这种一端是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端是分散软弱的平民的体制下,很难出现政治自由,哪怕这个政体被冠以民主的称号。

既然民主潮流不可抗拒,贵族阶级注定消失,那么,人们要做的便是在新的形势下构建新的次级权力:用地方分权代替旧制度下不平等的地方自由;用政治团体(即政党)代替封建时代的贵族制。在他的心目中,为了维持政治自由及良治,政治中必须存在次级权力这种机制;必须有某些中介团体来满足这种功能。这是政治体制中的轴承、润滑油和传送带,沟通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至于这些团体是否有违民主的精神,带有某种精英甚或寡头的色彩则并不重要。依此逻辑,现代政党只要能够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条件,了解他们的意愿诉求,及时把握社会潮流的动向,并加以整合,将其更准确更专业地表达出来即设置议题,代表人民参加政治过程,便可算较好地行使了政治中介、次级权力的功能,便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国家政治也因此变得理性而可控,稳定而有序。它们头面人物的精英出身或凌人做派,优渥的生活或坊间的传闻,偶尔的失策或经常的愚蠢,便都是可以容忍的。

但法国政党是否总在令人满意地行使着自己的政治功能,是值得怀疑的。

三、海燕还是企鹅:两场政治风暴中的法国主流政党

在“黄马甲运动”的高潮阶段,经常能够看到一个标语——“1789-1968-

^① 而在18世纪的英国,贵族一方面仍承担着一定的地方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又不享有在税赋上的过多特权。

^②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55页。

2018”。这是示威者们对自己运动的性质与传承的定位。细细想来，1789年大革命毕竟是开天辟地的事，而“黄马甲们”从事的还只不过是一场运动，与“革命”的经典定义相差甚远。更具有可比性的，倒真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

这两场运动，时代背景、起因、过程都有相异之处。但从政治学角度观察，一个共同特点是均脱离了传统政党、政治组织、工会、政治领袖的影响，遑论领导。政治精英严重缺位失能。在这点上，“黄马甲运动”比“五月风暴”更为典型。

“五月风暴”的先锋是大学生，而后运动扩展到工人及市民之中。它的直接起因甚至比“黄马甲运动”更为出人意料：农泰尔大学（为纾解巴黎大学过多的学生人数而于1964年在首都郊外农泰尔设立的校区，其丑陋的水泥建筑被广为诟病）遵照新任国民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一书作者）提出的法案并加以发挥，在学生宿舍男女混住的楼层中打了隔断，规定男生晚上不得进入女生房间。21岁以上的成年女生可以“访问”男生宿舍，21岁以下的女生则需得到家长的批准及宿舍看门人的认可。这个规定引起了学生们的普遍不满。^①1968年1月8日，大学新游泳池落成，青年与体育部长出席仪式。此时一位后来成为“五月风暴”中著名人物的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红头发达尼或红色达尼）走到他面前质问道：“我看了您的青年白皮书，书里没有谈到性的问题。”部长回答道：“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只要跳到游泳池里就能得到发泄。”达尼回道：“我得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式回答。”^②

关于“五月风暴”的导火索其说不一，笔者认为，农泰尔的风波未必是它的起源，虽然它经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算是标志性事件之一。要弄清1968年的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要观察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潮流，特别是分析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的思想状态。

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似乎一切都正常得“岁月静好”。印支与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带来的烦扰已经解脱；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走向稳定；特别是经

^① 据说戴高乐将军知道这件事后，曾不解地问身边的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咖啡馆会面呢？代沟之深，可见一斑。

^②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0页。关于这段有名对话的确切内容其实也众说不一。有在场者回忆道，部长挖苦了达尼的尊容，而达尼回答的是“希特勒万岁”或“我听到了一个希特勒青年部长的回答”，也有人认为这是另一个学生的话。《青年白皮书》是米索夫部长按戴高乐总统的指示编写的，对当时法国年轻人思想的判断基本是南辕北辙。

济状况令人满意,正处于“黄金三十年”的繁荣之中: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5%左右,失业率很低,^①货币坚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在1967年,法国人的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了3.6%,小汽车、家用电器等成为了各个家庭的宠儿。78岁高龄的戴高乐总统在1967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辞中宣告:“我充满信心地祝福1968年的到来。”“在这么多的国家政局不稳之际,法国仍将井然有序,起到表率作用。”“今日的法国不会像往日那样因危机而瘫痪。”^②

战后的婴儿潮带来了大学生数量的激增。1938年时,法国只有5万名大学生,1958年增长到17.5万,1960年25万,到了196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53万。虽然如此,此时的大学生仍然是社会中的骄子。^③只要完成学业(哪怕只得到大二或大三的文凭——法国大学中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分别能得到一张不同证书),获得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足以进入中产的收入是自然而然的事。大学教育特别是文科教育,仍然一秉法国传统,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按照一般认知,他们是这个时代、这种社会秩序的受益者,理应成为社会中的安定因素。

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年代,这样一群人中,迸发出了“五月风暴”。那么,到底原因何在?当时“谁敢说他曾预测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④甚至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种种征兆。这正是政治体制失灵、政治精英失职的表现。

作为事后诸葛亮,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此时的大学生乃至整个青年一代,深受两种情绪的影响。一种是厌倦颓废(被教育方式和旧道德所强化),一种是左倾乃至革命思潮。

此时的法国社会,由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只是一个方面。对年轻人来讲,这同样是一个传统的权威受到鄙视、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挑战(戴高乐夫人终其一生,拒绝与离异女士同桌用餐)、传统的人生选择受到质疑的时代。父母一辈的努力工作、恪守社会规范的教诲失去了市场。大

① “你必须明白,就业会成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法国人永远不会接受失业人口超过三十万……”时任就业事务国务秘书的希拉克回忆蓬皮杜总理1968年对他的叮嘱(现在法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了300万)。参见〔法〕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回忆录:步步为赢(1932—1995)》,李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② 〔美〕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程洪波、陈晓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

③ 在1960年,只有2.5%的工人子弟、1.5%的农民子弟有望升入大学。

④ 〔法〕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回忆录》,第57页。

学中僵硬的管理体制、教授们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更使他们反感。爵士乐、流行歌曲、摇摆舞、性革命、大麻、超短裙、牛仔裤成为时尚。当然，更重要的是，在物质充裕、对改革或改变的希望相对迷惘、而美苏对峙下的战争梦魇又挥之不去的背景下，他们很容易出现悲观与玩世不恭的心态，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深深的、难以描述的厌倦。

1968年3月15日，著名记者维昂松-彭特(Pierre Viansson-Ponté)在《世界报》头版发表文章《当法国感到厌倦》，其中写道：“真厌倦，这已成为今天公众生活的特征。”“青年人感到厌倦”，“戴高乐也感到厌倦”^①(但他还得领导下去)。法国人通常热衷于改变，但现在已不确定在这方面左派是否能比右派做得更好。“人们没有热情，一点也不想建设法兰西”。在超级大国时代，法国也不再能影响世界。“一个国家也会在厌倦中死去。”而实际上“热情和想象力是比福利和扩张更必要的东西”。^②遗憾的是，这样有洞察力的人不多。他的话也没有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视。

大学生们的厌倦到了一定程度，自然会导致对激进变革的向往。法国政治中自大革命以来本就有激进传统，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如反殖民主义斗争、反对越战、民权运动等的影响，大学生中乃至整个知识界、舆论界的主流思潮明显左倾。法国从不缺少质疑现状的思想资源，既有外国的，更有本土的：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托洛斯基、马尔库塞、卢卡奇、萨特、阿尔都塞、加缪、福柯、布尔迪厄……毛泽东思想在法国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在此时的纪录影片中，大学生们在辩论时大段引述列宁或毛主席语录的镜头给人印象颇为深刻。而相对“理性”“冷静”的学者则对青年人多少失去了吸引力。“宁可跟着萨特犯错，也不跟着阿隆正确”是此时的著名口号。很多时候，反抗本身就是意义。“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反叛所针对的对象多种多样，共同点只剩下叛逆的欲望和方式、对现存秩序的疏离以及对任何形式专制的深恶痛绝。”^③在激进学生眼中“法西斯主义就是一切带权威性的东西”。^④

① “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转引自〔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第21—22页。

② 转引自〔法〕洛朗·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万家星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③ 〔美〕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第11页。

④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第171页。

此时的法国,经济虽然总体向好,但社会阶级、贫富差距并未消失。农泰尔大学校园旁边更有一片瓦楞铁皮盖顶的北非和葡萄牙移民居住区。“公寓里的大学生们随时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着一门社会学课。”^①

于是,在厌倦情绪和革命冲动的相互激荡下,“五月风暴”突然降临了。

1968年3月22日,上百名学生在巴黎歌剧院附近游行,砸烂橱窗,焚烧美国国旗,高呼“民族解放阵线必胜”,抗议越战。其中四名农泰尔大学的学生被捕,而校长拒绝为他们说情以谋求保释。于是,1967年成立的拥有大约500名成员的“疯人派”(enragés,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忿激派是同一个词)占领了学校行政楼的教务处。以红色达尼为代表性人物的“3·22运动”(语出古巴革命的7·26运动)诞生,并迅速成为五月风暴的先导力量。

1968年5月3日,几百名极左派学生在巴黎大学(索邦)集会。警察应校长请求进入学校,^②抓走了近300名学生(绝大部分在当天夜里被释放)。这是“五月风暴”的正式开端。农泰尔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校园相继被校方宣布关闭。学生们开始游行,要求释放同学、重新开放校园、警方撤出、校长辞职。这些口号引起了不少教师的共鸣。游行迅速开始带有暴力色彩。5月10日,街上出现了第一批街垒。不同阶层的市民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5月11日凌晨,警方向示威者进攻,街垒战开始。示威者方面有近百人受伤。学生们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全国都在谴责警方的行为。卡斯特勒教授写道:“这一夜过去后,问题不再是校长是否应该辞职,部长是否应该滚蛋了。制度的问题提出来了……它抛弃了自己的青年。”^③

蓬皮杜总理提前结束了对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他在1968年5月13日宣布重开索邦,赦免被判刑的学生,号召学生们为重归秩序而进行合作。但为时已晚。就在这一天下午,几十万大学生、工人和市民在巴黎游行。游行队伍中各种口号花样繁多,其中比较有煽动力的如“我们都是疯人派”或“十年,足够了!”^④运动迅速扩展到外省的主要城市。到了5月21日,法国750万工人中的一半已参加了罢工。游行示威、占领大学和中学的校园成为了潮流。

①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第46页。

② 法国从中世纪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是:大学属于私人空间(domaine privé),警察未经校方允许不得进入校园。

③ 转引自[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第52页。

④ 1968年正是戴高乐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的第十个年头。

而“五月风暴”的标志性内容——各种集会辩论更是如火如荼。言论充分自由，各种声音并存，但目标都是对现行社会与秩序的批判，对理想生活的探讨。各种小报如《行动报》《疯人报》纷纷面世；油印机及传单也最后一次风行一时。当然，更多的标语被直接写在了各个建筑物特别是学校的围墙与大门上，其中很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诸如“禁止禁止”“海滩就在铺路石下面”“梦想即现实”“夸张是创新的开始”“街垒封锁了街道却开辟出道路”“索邦大学将成为索邦的斯大林格勒”。也有惊世骇俗的“我越革命便越想做爱；越做爱便越想革命”或貌似深奥的“生活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话要说，但我不知道想说什么”。

法国社会陷入瘫痪。巴黎的日用品供应出现问题，加油站因无油可加而纷纷关门，连一部分电视台记者也开展了罢工。街垒战愈演愈烈，并有两位示威者丧命。1968年5月24日，运动到达了顶点，暴力冲突进一步加剧，而戴高乐总统仍保持沉默。许多观察家甚至政府成员都开始怀疑将军是否已自我放弃，国家政权是否濒临解体。而有意问鼎者如密特朗或孟戴斯-弗朗斯则开始纵横捭阖，做好了组织临时政府的准备。^①

1968年5月29日，戴高乐连蓬皮杜总理都没有通知便突然离开了巴黎。很多人认为他这时已经崩溃。一天之中，为了接班的政治谈判和政治交易在各个层级上几乎已经公开化。但其实是大家低估了戴高乐的意志与能力。他飞到位于巴登-巴登的法国驻德占领军总部，去会见总司令马黎将军，争取到了他的忠诚与支持。第二天中午，他回到巴黎，并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解散议会，组织公投，同时抨击了煽动运动的政治力量。当天下午，戴高乐的支持者和被前一段运动惊吓到的人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游行，形势顿时逆转。暴力冲突一直持续到1968年6月11日，但已不再能够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接下来，在6月下旬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派政党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激进而不失浪漫的“五月风暴”在持续了58天后结束了，虽然它的余波延续到了1972年。“革命者们准备好了一切，除了真正的革命”。^②

如何评价“五月风暴”的成败？作为一场社会革命（这也是大多数参加者的意愿），它是高度成功的。它为法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改变了一代人的思

^① 密特朗在5月28日的公开演讲中说道：“在法国，自1968年5月13日以来，已经没有了国家，甚至没有一些表象的权力安排来替代它……若有必要，我将自觉地承担起组成这个临时政府的责任。”转引自〔法〕洛朗·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48页。

^② 〔法〕洛朗·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93页。

想和生活方式,使法国悄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增进了社会的民主与自由。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思想的解放、公民政治热情的张扬、陌生人之间的和善友爱,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这也是每逢10周年纪念,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仍会有大量研讨活动的原因。但如果作为一场旨在夺取政权、更换政府的政治革命,它显然没有达到目的。

而或成或败,都与它的自发性、没有组织、缺少领导直接相关。

众所周知,戴高乐将军讨厌政党政治,认为党争是造成第三共和国后期及第四共和国失败的重要原因。到1968年,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传统右派政党已基本失去影响力。由戴高乐总统的追随者组成的保卫第五共和国民主联盟(U. D. Ve,前身为保卫新共和联盟 UNR)是右翼的主要政党。它对威胁到现存秩序、威胁到戴高乐政权的“五月风暴”自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法国共产党是左派阵营中的主流。它历史悠久、组织严密,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曾经是战后法国的第一大党,是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左派中的另一支队伍是社会党人。法国社会党或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同样是老牌政党,曾一度陷入低潮与分裂。1965年,为了应对总统选举,成立了以密特朗为主席的“社会主义与民主左翼联盟”(FGDS),包括社会党、激进党、各个原社会党大家庭的独立俱乐部即思想库。罗卡尔(M. Rocard)的统一社会党(PSU)也与之松散结盟。但此时社会党力量还远未整合完毕,法国社会党仍是其核心。

法共控制着实力强大的法国总工会(CGT)。在大学里,几乎所有的学生组织均受左派影响控制,其中主要的两个是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UNEF)和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UEC)。前者在1960年时曾有10万成员,占了当时大学生的半数。但之后内部派别林立、争吵不休,到“五月风暴”时仅剩三万余人。法共则直接领导着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

因此,无论是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还是在大学生组织中,法共都是左派的主导。面对“五月风暴”这样一场带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运动,它本应是天然的旗手。退而求其次,如果不能站在第一线领导,至少可以借势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上焉者是推翻戴高乐政府,取得执政权;至不济也能够树立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期获得更多潜在选票。然而,思想的陈旧僵化、领袖的故步自封、组织路线的宗派封闭,使得它基本站在了运动之外甚至对立面,

自我放弃了领导和主动。如果稍嫌刻薄地对法共在五月风暴中的总体表现做一个总结，那就是既没有洞察潮流的远见，也没有创造历史的激情，甚至没有利用时机的智慧。

法共的领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战后法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更无暇体认青年人的思想潮流与生活方式，仍然坚持阶级斗争是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 在法共看来，大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更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才是学生运动的唯一前途。因此，他们对于千奇百怪的新潮理论和层出不穷的“极左”组织抱有一种无端的敌意。在“五月风暴”开始时，他们首先成为了运动及学生的批评者。

早在1968年4月，法国总工会头面人物克拉苏基(Henri Krasucki)便在《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杂志上发表评论：“大家是否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开始以极端革命者自居？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进步学生运动引到脱离学生大众和工人阶级的邪路上去。”^②“五月风暴”甫一开始，时任法共政治局委员、后成为法共总书记的马歇则在5月3日的《人道报》(法共中央机关报)上写道：“每当工人阶级与民主力量的联盟取得进展时，总会有一小撮极左分子乘机破坏……虽然内部充满矛盾，这些百十人的小团体还是联合在了名为‘农泰尔-3·22运动’的旗号下。而其领导者则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本迪特。”所以，“必须大力剥去这些假革命者的伪装。因为客观上讲，他们是在为戴高乐政权和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必须与这些意图损害民主运动的极左分子战斗，限制其影响，哪怕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③对形势的这种分析，对参与者的这种定位，决定了法共及总工会既不可能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力量，也无法因势利导，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

马歇定调后，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也在次日发表声明，谴责极左分子假借学生中的一些不满情绪，干扰大学的正常运行，影响了多数学生的学习和考试。这在“客观上”成为了戴高乐政权的帮凶，损害了学生的利益。甚至直指

^① 必须承认，一方面，当时法国确实仍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得到真正保障；另一方面，此时的法国也不再处于左拉的《萌芽》所描述的状态。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无产阶级不断斗争的双重作用下，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年轻人的思想状况和诉求更不易为僵硬的教条所解释。

^② [法]莫里斯·拉杰弗斯：《1968年5月：铺路石下是镇压》，巴黎：寻找正午出版社1998年版(Maurice Rajsfus, *Mai 1968 Sous les pavés, la répression*, Paris, le cherche midi éditeur, 1998, pp. 209-210)。

^③ *Ibid.*, p. 210.

“3·22”运动的领导人是法西斯分子、种族主义者。

法共谴责了警方在1968年5月11日凌晨对街垒的攻击,也肯定了1968年5月13日的大规模罢工游行。但仍不忘号召“劳动者和学生”反对那些“冒险分子”的挑衅行为,因为这会给戴高乐政权的野蛮镇压提供借口,会伤害到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本利益。

1968年5月15日后,运动进入高潮。总工会组织了罢工,但其总书记塞居(George Séguy)又认为:“参加这场运动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广大人民群众,既不是为了粉饰戴高乐的个人独裁,也不是为了一场暴动式的罢工。”“现在并不是空谈对社会的深刻改造,其中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①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将军返回巴黎并发表讲话后,法共不顾“五月风暴”尚未结束,已开始积极准备议会选举了。法共领导人、1969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杜克洛(Jacques Duclos)在1968年6月1日向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说:“我们希望走向斗争,但必须在秩序的气氛中和公共安宁的条件下。”^②在1968年6月10日,面对右派势力的反扑,总工会断然拒绝了发动总罢工的提议。6月14日,马歇在卢森堡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我们希望依靠劳动者和人民大众的意志,而不是通过颠覆的手段来改变政治制度。”^③这是在向将军输诚吗?

这就是法共、法国总工会、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在五月风暴中的表现。怀疑、否定、谴责是主流倾向;不领导、不支持是既定方针。极左分子(gauchistes)、盗贼(pègres)、冒险主义者(aventuristes)、小团体分子(groupuscules)、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es)等名词被反复应用以形容他们不喜欢的学生。一个自称宗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却忘记了列宁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的论断。以至于一位右派学者伯恩(E. Borne)在1968年6月19日的《世界报》上写道:“如果在这场危机中最困难的日子里,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这全有赖于戴高乐政权与共产党的默契。表面对立的双方都受到了这场革命洪流的冲击,也都采取了各自的手段去遏止它。”^④

法共的这种策略,使它失去了革命政党的声望,自我限制了引领潮流、把控局势的能力。在1968年6月30日结束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共便受到了第

① Maurice Rajsfus, *Mai 1968 Sous les pavés, la répression*, p. 214.

② Ibid., p. 217.

③ Ibid., p. 220.

④ Ibid.

一次惩罚。同年8月的“布拉格事件”，更使它因一贯紧跟苏共的立场而大受打击。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统一后的社会党已在密特朗的领导下超越了法共，成为了左派阵营的代表。“五月事件损害了法共的动力。它无法应对变化了的时代、解放了的社会、特别是新一代思想激进的青年等新形势……这样，以1968年6月的立法选举为标志，它开始了新一轮的退潮。”^①

仍处于恢复上升期的社会党大家庭没有如此愚蠢，对这场运动多少保持了中立态度。密特朗、孟戴斯-弗朗斯、法国民主工联(CFDT)等更积极参与各种密谋谈判，力求利用运动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虽然事后捞到了不少好处，但他们显然也没有站在运动的前列。真正在五月风暴中起到鼓动领导作用的倒是一些“极左”的学生组织如“3·22”运动、革命学生联合会(FER)、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或哪怕是索瓦热奥(Sauvageot)^②接手后的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但它们既没有类似政党的确定纲领与组织纪律，也没有一致的意识形态指针。一遇到问题，内部先就吵成一团，无法统一意见。就这样，第五共和国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第一次遇到了危机，精英政党第一次集体失语。没有人在合格地扮演政治中介的角色，行使次级权力的功能。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爆发、发展直至落幕。

回到“黄马甲运动”的话题。如前所述，这是一场在新传播媒介技术条件下的缺乏领导者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没有统一的政治倾向，其政治光谱涵盖了左派、右派与极端派，其中既有不同党派的党员，也有大多数根本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参与者。因此各政党无法对其施加影响。他们没有统一的职业，更没有统一的雇主，不是某个工会的成员，很多自由职业者、手工业工人、小企业的老板也在队列之中。因此，各工会也很难像在1995年法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小红帽运动)时那样收放自如。多元化、自发性、扁平化是它的根本特征。它没有精密的组织动员，也没有固定公认的领导者。脸书和推特形成了有效的新型社会组织网络。若干自称运动发言人的“黄马甲”接受采访、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没有得到任何授权，也没有任何权威性，因而昙花一现。所有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传统精英中介：政党、工会、职业媒体乃至

① [法]多米尼克·安德法多：《法国共产党：从变化走向泡沫化》，巴黎：罗歇出版社2005年版(Dominique Andolfatto, *PCF: de la mutation à la liquidation*, Paris, Editions du Rocher, 2005, p. 14)。

② 未必有人能够自封为“五月风暴”的领袖，但确实有三位代表人物：科恩一本迪特，索瓦热奥及兼任统一社会党学生(ESU)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SNF-Sup)主席的年轻讲师热斯马尔(Geismar)。

公共知识分子都失去了作用,未能介入领导。而“黄马甲们”也一致声称运动的非政治性,即不愿意被政治阶级所利用(régupérés)。^①“那些工会和政客一样,不过是想装满自己的口袋。我们只能靠自己。”^②“我们认为政府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左派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人也什么都不了解。”^③他们对主流媒体更加抗拒厌恶,认为后者热衷于夸大暴力场景,歪曲了运动的诉求,破坏了“黄马甲”的形象。因此,这场运动“就像旧制度下的饥民暴动、巴黎公社、‘五月风暴’一样,超越了政党与工会组织等一切政治博弈机制,直接挑战整个政治制度。”^④不。五月风暴中,至少还有若干“极左”派的小政党、学生组织,至少还有几个有号召力的头面人物。而这次的情况,是法国现代政治史中前所未有的。

主流政党一如在五月风暴中那样颓废地无所作为。在20世纪80—90年代中的“四人帮”^⑤中,左派阵营的法共和右派阵营的法国民主同盟已退出舞台,剩下的是传统左派社会党和传统右派共和党(由保卫共和联盟演变而来)。在他们旁边,有马克龙的自称中派实则新自由主义派的共和国前进党、梅朗雄的“极左”的不屈的法兰西党与勒庞的“极右”的法国国民联盟(RN,即以前的国民阵线FN)。

它们都对国内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政治格局、社会条件、经济形势,特别是民生的艰难、民众的愤怒情绪缺乏准确认知,更不用说设置议题、将民意引导到正常的政治机制中来加以应对。2018年11月16日,第一场大游行的前夜,总工会总书记马丁内兹(Philippe Martinez)还在“法国国内电台”(France Inter)谴责“黄马甲”的动议,认为这是一场“老板们的运动”(许多运输行业公司的老板也在反对燃油税)。法国民主工联则认为在高速公路上设置路障的

① “他们不停地表示不想被‘利用’”。Gérard Noireil, *Les Gilets jaunes à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 p. 92. “对‘中介团体’的不信任,不断加剧了对它们‘利用’这场运动的反感。”p. 66。

② Cyril Graziani, *Le peuple et le Président*, p. 92.

③ Ibid., p. 67.

④ [法]弗朗索瓦·迪拜:《怒火的政治转换是否可能?》,载《关于“黄马甲运动”的若干假设》,巴黎:发现出版社2019年版(François Dubet, “La transformation des colères en politiques est-elle possible?” in “Gilets jaunes” *Hypothèses sur un mouvement*, Paris, Edition la Découverte, 2019, p. 43)。

⑤ 当时法国媒体对四大政党、两大阵营格局的调侃。左派阵营由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右派阵营则包括保卫共和联盟(RPR)与法国民主同盟(UDF)。

行为很容易为极右派所利用。^①

运动爆发后，共和国前进党自然站在了它的对立面。但不可理解的是，作为反对党的社会党、共和党也没有积极发表意见：这不正是打击马克龙政府的好机会吗？倒是梅朗雄和勒庞，以及以个人名义表态的前社会党总统奥朗德至少表示了对“黄马甲们”的理解与支持。11月17日，梅朗雄便说道：“我们很高兴。我们从马克龙上台一开始便坚信他的政策没有社会基础。‘黄马甲’可以走得很远，这是一个转折点。”他批评了社会党和总工会的态度：“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不理解这是一个爆炸性事件。”^②他参加了当天在巴黎的游行，并得到周围人的欢呼：“梅朗雄，总统”！勒庞也在第一时间表示了对“黄马甲们”的支持，但没有参加游行。她认为：“我坚持我的（支持）立场。但我尊重这场示威的非政治性特点……政党领袖的位置不在游行队伍之中。”^③“凯旋门事件”后，她在会见菲利普总理时说：“不要被你们的议会多数蒙蔽了双眼。政府必须让步，你们不会成为第一个为不得人心的政策而让步的政府。”^④虽然不是运动的领导者，虽然可能被视为摘桃派，但这种态度至少博得了“黄马甲”及多数民众的好感。相对于不可理喻地保守的社会党和共和党人，这已经可以算是政治智慧了。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这两个政党也都因此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这与“五月风暴”时的场景十分相似：面对群众运动时，越是主流的政党越保守，边缘性政党反而有勇气一搏一当当时的法共，像极了现在的社会党；当时社会党人的表现，倒与不屈的法兰西党差相仿佛。

知识界的主流对“黄马甲运动”持同情态度，但已不见“五月风暴”时萨特站在比扬古的雷诺工厂门前发表演讲的豪情，不见布尔迪厄1995年声援铁路工人罢工的风采。尤其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红色达尼，现在已经成了自由主义者总统马克龙的密友。为其出谋划策之余，不忘挖苦远比当年“3·22”运动文明的“黄马甲”几句：“在1968年，我们为反对一个在台上的将军而战。今天的‘黄马甲’则是要求一个将军上台。”^⑤科恩一本迪特先生，这当然不是事

① 确实有13个大型企业的老板于2019年12月18日在《世界报》联名发表文章，称“我们坚信法国的经济必须更加有包容性，经济发展应与社会发展同步，社会团结应从经济团结做起。一句话，经济与金融应当服务于社会。”

② Cécile Amar et Cyril Graziani, *Le peuple et le Président*, p. 40.

③ Ibid., p. 41.

④ Ibid., pp. 118-119.

⑤ Gérard Noireil, *Les Gilets jaunes à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 p. 43.

实。不要因立场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有趣的是,马克龙与菲利普也同样认识不到这场运动的自发性、群众性,在第一时间分别会见了各政党、各工会的领导人,试图在他们的协助下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殊不知,除了若干推心置腹或隔岸观火的劝告和建议,这些会见实在是于事无补:没有一个对话者能够左右“黄马甲们”的行动。今年初为时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面对的是同样的窘境。主流参加者是地方议会议员、行政首长、各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即传统的政治精英、政治中介,但他们仍能够在法国政治中搅动风云吗?

很多时候,人们意识不到自己经历的某些貌似寻常的事件(在法国,罢工游行几乎无日不在)的重要性。50年后的现在,没有人否认“五月风暴”深刻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那么,“黄马甲运动”呢?我们是否同样正在见证一段历史?它是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生态的曙光?这两场运动的共同点,都是自发的群众摆脱了政治精英的控制,偏离了政治机制的框架,来提出自己的诉求,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同之处在于,“黄马甲运动”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而“五月风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有更充分的准备。

“黄马甲运动”当然是一场危机。但危机是可以分成等级的。由某项政策造成的危机可以很严重,但一般并不致命,最多是取消提案就好。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法国1986年底因高教改革法案引起的全国性大游行及总罢工,其规模甚至超过“黄马甲运动”。但当政府撤回法案、高教部长辞职后,事态很快就得到平息。政府危机比这高一个等级,但不满大约只针对某一个政府。一旦政府改组,危机便随之解除。在法国还会出现国家危机,此时成为问题的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如1958年由议会主导型的第四共和国过渡到行政主导型的第五共和国。再严重一些则是制度的危机:人们质疑的不只是某项政策或某个政治家,而是整体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如果我们给出一个稍嫌危言耸听的判断,则“黄马甲运动”便带有制度危机的色彩,预兆着法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遇到了危机:民众已开始怀疑现行的政治体制,不再相信他们的诉求与利益能够得到政治精英、政治中介团体的体察、整合与代表,进而在决策层面进行体

制内博弈，使问题得到解决。^① 面对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由政党或工会发动，领导人去向警方提出游行申请，手挽手组成队列并有纠察队护卫以防止不相干者混入队伍，高举旗帜与标语并沿途散发传单，而是选择了自我组织、自行表达，将所有的“代表”即次级权力抛在一边，甚至深怀警惕与敌视。“黄马甲们”不断谈论民主这个字眼，但他们要的已不纯然是代议制民主(*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而是一种尚不同于直接制民主的“公众民主”(*la démocratie du public*)或“公民民主”(*la démocratie du citoyen*)。前面提到过的运动中出现的若干政治性口号如公民动议公投、国民议会的混合选举制、人民院的设置等，都带有这种“公民民主”的色彩。对他们来讲，“人民”“公民”这些概念不再是指一群抽象的、面目不清的、只在选举代表时才有意义的乌合之众，而是活生生的、产生了主体意识的自我及其同志。“黄马甲运动”的非政治性，对政府、议会、政党、工会、媒体、选举等的排斥，都可以从这种对“人民”的新理解、对一种新型民主制的憧憬的角度加以解读。一句话，人民不再信任精英，希望自己解放自己。而我们知道，在政治生活中，信任一旦失去，再建立起来便相当困难。

法国学界对这种新现象十分敏感，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出现了问题。植根于卢梭或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的新的权力合法性理论——公民民主则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政治精英的分工简洁清晰：工会反映各行业劳动者的利益，政党负责将这些诉求整合到议会、政府等制度框架中加以协调。“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人民应远离政治决策过程……但这次‘黄马甲们’没有人组织，也形成了明确而连贯的诉求，特别是激烈批评了代议政治体制。出现了‘人民是主权者’、‘马克龙，我们不是被放牧的羊群’、‘当选者，我们会和你们算账’等口号……左派或右派的政党、工会都不会在这个运动中获益。”^② 人民希望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③ 毕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

^①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伊斯顿著名的政治系统图：环境的要求整合为输入，进入决策中心，然后形成输出即公共政策，其间并有反馈与微调。正常系统的输入端功能当然应由政治精英、政治团体来行使。

^② [法]菲利普·马提耶尔：《黄马甲还是代议制民主的失信》，载《关于“黄马甲运动”的若干假设》(Philippe Martière, “Les Gilets jaunes ou le discredit de 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in *Gilets jaunes Hypothèses sur un mouvement*, pp. 54-56.)。

^③ 一位门房太太瓦莱利(Valérie)“不断对自己说，只要我们的领导人挣得比我们多，事情就不会变好。”参见 Cécile Amar et Cyril Graziani, *Le peuple et le Président*, p. 172。

不靠神仙皇帝”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传统。

面对这种全新的局面,面对变化了的左右分野、阶级队伍,政治精英如果不能适应形势,自我调整,便势必会被淘汰,势必会有更敏感而明智的新兴政治力量出现。

笔者不认为代议制民主可以在短期内被取代,更谈不上法国代议制民主的终结或政党的终结。但是,它确实受到挑战、面临着危机。与之平行或至少是其补充的新的民主因素与形式已崭露头角;新的次级权力的出现或干脆是次级权力的退场亦不再不可想象。人们还不清楚这些现象发展的确切方向与速度,但“人民”的重要性与自觉性肯定成了不可忽视、不可遏止的潮流。

所幸这还不是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危机,“黄马甲们”要求的只是更真实、更彻底的民主。三色旗与马赛曲仍是运动的象征。

四、叶公好龙式的民主主义者?

除了政治分析外,“黄马甲运动”也给思想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启示。如何对其进行评价,既是一个真正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意义很强的政治问题。如上所述,若干法国学者认为,它反映的是下层人民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与绝望;对政治精英、政治团体的失去信心;对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组织方式的期待,要求将没有人民的代议制民主转化为人民在其中享有更多发言权的公民民主。当然,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将他们看作极端分子、打砸抢分子,不愿遵守政治生活的规则,在体制内提出自己的主张。在诸多批评中,最为常见的是指“黄马甲运动”为民粹主义,是欧洲民粹主义潮流的一个典型代表。

其实,法国学术界、新闻界中不大有有人使用民粹主义(*populiste*)这个词来形容“黄马甲”,而更倾向于将其称之为“民众的”(*populaire*)运动。即使对民粹主义,大家似乎也没有完全视之为洪水猛兽,2018年,一位比利时哲学家便出版了《保卫左翼民粹主义》。^①

^① [比利时]桑塔尔·穆夫:《保卫左翼民粹主义》,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18年版(Chantal Mouffe, *Pour un populisme de gauche*, Albin Michel, 2018)。

这个概念值得人们认真定义。什么是民粹主义？它是指 19 世纪末俄国式的认为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还是指一个魅力型领袖越过政治精英、直接诉诸大众，如同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布朗基、布贾德(Pierre Poujade)或干脆是戴高乐将军？还是指像“五月风暴”或特别是“黄马甲”这样，没有领袖也缺少组织的群众运动？它的适用性真的有这么广，可以拿来当作标签，贴在任何一件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上吗？

这些问题可以更精确地表达为：是民意没有通过“正确的”途径加以表达构成了民粹主义？是“后果”不好的群众运动意味着民粹主义？还是干脆民意本身便是民粹主义？

对第一个问题，即民意的非正常途径表达构成了民粹主义，我们可以重复一下法国的体制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偏差。笔者认为，人类政治史的一条主线便是平民与精英的力量与利益的博弈。在博弈中，任何一方取得过度优势，都会影响政治体的稳定与总体利益。而强调和谐、平衡的中庸、中道原则方为正办，为古今中外的多数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无论是梭伦改革时的兼顾贫富，是混合政体的思路，是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还是托克维尔的次级权力理论，都是沿着中道的思路展开的。而法国现行的代议制民主体制，也是这种原则的体现。它并不意味着精英的消失、民众的擅专即绝对民主，而是巧妙地将贵族制与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协调精英与平民的不同利益，是一种古典思想家眼中的贵族——民主混合政体（本文第二部分中对相关理论已有所介绍）。

所谓精英首先是指行政权。它从来是精英的专利，平民基本无从染指。能够代表后者的利益与精英博弈的制度安排是议会、议会活动的主角政党，以及工会、压力集团及媒体。

但随着代议制民主实践的发展，议会、政党也都成为了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工会、社会团体、媒介亦紧随其后。1936 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时期，议会中有将近 50 名工人议员。那时绝大多数工人只有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学历。今天，法国的工人人数有所下降，但仍占了活动人口的 20%。他们中大多数有高中会考文凭（凭此可无须高考进入大学）。但本届国民议会的 577 名议员中已看不到一个工人了。各政党、工会的头面人物基本都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或国家行政学院，精英阶层变得日益同质化。

这不一定构成问题。我们可以认为法国的统治阶层或政治阶级都是精英,但只要精英之间有所分工,不同的精英团体分别行使各自的功能,使社会各阶层的民情得以体察,民意得以整合,各种诉求能够在体制内得到满足,各方利益得以保障与平衡,那么,即使有莫斯卡特别是米歇尔斯的批评,它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制度框架,可以保证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并抑制民粹主义倾向的出现。

但政治现实经常距理想状态甚远。精英们未必能逃脱孟德斯鸠的预言:任何权力只要不受限制便会被滥用。他们不能理智地自我设限,而是不断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必须承认,在世界范围内看,法国的贫富差距尚不算十分严重,但与20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L'INSEE)的数据,在2008—2016年间,法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在逐年下降,而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下降尤为严重。本文第一部分中引述的下层民众生活的贫困化现象足以令人心惊。在另一端,拜新自由主义潮流所赐,富人们的财富迅速增长。马克龙政府取消巨额财产税更增加了人民的被歧视、被剥夺感。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阶层壁垒有增无已。法国已如柏拉图笔下的各希腊城邦,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的两个国度。双方的利益与诉求渐行渐远,也缺少必要的沟通和相互的理解。即以这次的燃油税为例:环保减排是其目标,然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碳,在多大程度上是富人的时尚口号而非穷人的切肤之痛?法国收入前10%的家庭比后10%的家庭每年多跑三倍的公里数,但他们对价格并不敏感。他们更热爱环保、更高尚吗?更何况环保是否就意味着涨油价,就一定要损害升斗小民的利益?人们凭常识便可以认识到,精英们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的破坏一定更大。

少数智者提前感受到了悲凉之雾,感受到了这种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隔膜。1993年,布尔迪厄和他的团队出版了《世界的苦难》,^①一部对法国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系列访谈调查。书中生动描写了地位低下者的各种无助、无望,特别是心理上的苦痛:失去自信心,感到自己的一无是处。这个阶层包括了陷入困境的小农、前景不明的钢铁工人、邮局职员、秘书、小商人、社会工作者、低租金住房的看门人,甚至包括一部分教员和记者。他们的职位经常没有保障,而且尽管努力工作,却不能感觉到被承认,不能带来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他们

^①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无法计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前途，低下的收入使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这些人不在少数，但又不为人所注意，是一群社会中的“看不见的人”(des invisibles)。2009年，勒布朗撰写了《被社会无视》，^①进一步完善了布尔迪厄的观察。同年进行的一份关于“法国不平等现象与社会公正”的问卷调查也观察到了人们不满情绪的增长：(1) 在过去10年内，个人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2) 与朋友、父母、同龄人相比工资太低；(3) 因自己的工资及住房而感到社会歧视。^②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被蔑视的社会中”。德勒鲁瓦(Jean-Paul Delevoye)在2010年12月16日的《世界报》上写道：“我无法否认社会中因状况恶化而产生的焦虑在增长。我们的一部分同胞正面临这种状况。我们不认识这些人，甚至想不到这些人，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的法国’(la France des invisibles)。我估计有1500万法国人，每到月末时手里只剩下50—150欧元。我不安地注意到很多超额负债的人已经第二次或第三次进入‘个人重振计划’(PRP, 即变相破产)，因为他们的收入结构性地低于支出。”2018年7月8日，曼科(Alain Minc)在《解放报》上明确指出：“不平等的现象已过分严重。我们看到暴动的可能。”更有识者警告法国社会面临重归阶级斗争的危险。

有时，收入的不平等只是表象，人们不满的理由经常来自于看不到改善与上升的前景。在“黄马甲运动”中当然有暴力行为。但是，社会中同样存在着“软暴力”，即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对劳动的压榨乃至迫害：控制手段的多种多样、失业、非无限期合同、不安全感、焦虑、因拮据而失去的尊严等等。整个平民阶层为其所苦。对他们而言，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灯红酒绿和奢侈品商店毋宁是现存秩序的象征，于他们又有何意义？如果说“五月风暴”的起因之一是“普遍的厌倦”，那么按照许多知识分子观察，现在笼罩着法国的经常是一种“普遍的苦恼”(la malaise générale)。这会发展成普遍的愤怒吗？

1848年1月27日，七月王朝垮台前一个月，托克维尔针对当时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倾向在议会中发表了著名讲话：“先生们，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

① [法]吉尤姆·勒布朗：《被社会无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Guillaume Le Blanc, *L'Invisibilité sociale*, Paris, PUF, 2009)。

② [法]米歇尔·福色、奥利弗·伽朗：《面对不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法国人》，巴黎：阿尔芒·高兰出版社2011年版(Michel Forsé et Olivier Galland, *Les Français face aux inégalités et à la justice sociale*,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激情正从政治激情变为社会激情了吗？你们没有看到他们当中逐渐散布的观点和思想不仅要推翻现有的法律、内阁和政府本身，而且要推翻社会，动摇社会今天赖以存在的基础吗？”^①托克维尔不仅认识到了民主的不可避免性，也预见到了社会主义潮流的到来。但放眼今日法国政坛，托克维尔一流的人物又有几个？

因此，如果政治机制本身出了问题，上下阻隔，政治中介失灵，那么，人民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提出自己的诉求。或是求助于新兴政党；或是追随一位魅力型领袖；或是尝试用某种形式自己发声。

如前所述，自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党格局不断变化，各政党的兴衰更替速度也颇为可观。为何一些曾风光一时的法国政党会迅速失势？这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气运。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口号与纲领，引领潮流，是因为及时把握了民意及其动向。在这种风云际会中，自然便会涌现杰出的政治人物，然后便是这个政党的蓬勃兴旺。可是一旦取得了相当的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政党便很容易沉迷于自己获得的利益与权力，逐渐变得僵化、官僚化、封闭化，自我隔绝了与人民的联系，从而被人民抛弃。可以概括而言的是，所有败落的政党如法共，都是因为没有行使好自己的政治功能；所有尚能维持的政党如社会党、共和党，在这方面都是勉强合格、苦苦支撑；所有呈上升态势的政党如不屈的法兰西党、国民联盟，都对民意更为敏感。这里尤为值得观察者注意的是国民联盟。随着得票率的提高，它正在逐渐走向“正常化”，希望进入主流阵营。投它的票，已渐渐不再是政治禁忌。

“平民领袖”操控民众，在柏拉图那里便被视为一种危险。但一个魅力型人物横空出世，越过政治精英，直接诉诸人民，在第五共和国中只有一个例子：戴高乐将军。^②之后没有一个政治家再具有他的个人威望与号召力。而厌恶政党、受人爱戴的戴高乐将军自己显然没有试图掀起“民粹主义”狂潮。进入

① “编者导言”，载〔法〕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第9页。

② 1962年，戴高乐将军提出修宪，将总统选举办法由国会选举改为公民直选。这等于剥夺了相当一部分原属于政党、政治精英的权利，因而遭到了各派传统政党的一致反对。雷诺（Paul Reynaud，曾任第三共和国总理）在10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我们共和派而言，法国就在这里（指波旁宫，国民议会所在地）而不是其他地方……从1789年开始，人民的代表们就知道……他们就是国家。民意的最高体现就是他们（选举议员）的选票。”参见〔法〕让-雅克·舍瓦利埃、杰拉德·高纳克：《1789年以来的法国政治制度史》，巴黎：道拉兹出版社1991年版（Jean-Jacques Chevallier et Gérard Conac,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régim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nos jours*, Paris, Dollaz, 1991, p. 680）。密特朗也称戴高乐政权是“连续的政变”。

20世纪70年代后，各派政治家均已不再带有光环，奥朗德总统更自我期许为“正常人”(un homme normal)。^①因此，对“平民领袖”的担忧，至少在当下的法国是一个虚构的危险，一个唐吉珂德的风车。

“五月风暴”特别是“黄马甲运动”，则完全脱离了政党政治的轨道，也没有受控于任何一位领袖。这是人民因对传统政治中介团体的失望而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尝试。

精英们经常认为民众不理智，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参政，认为他们容易受人拨弄。勒庞的《乌合之众》因此得到很多人的过度欣赏。

但精英也未必总是理智。法国历史中不乏由于精英的冲动而造成的失误。我们时常听到对冷静、理智的呼吁，却似乎很少承认这更多是现行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的要求。平民之所以容易不冷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境遇过于悲惨，所以愤怒的阈值比较低而已。

人民有没有能力参与政治？必须承认，法国的政治迄今为止是一门精英的艺术。出身、财富、人脉、政治经验之外，连最基本的演讲术、辩论术、修辞学，都不是平民所擅长的。这也是代议制民主存在的重要理由。但是，按伊斯顿的定义，政治就是价值在社会中的权威性分配，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下层民众水准再低，也不至于不了解自己的利益何在。正如密尔所言：“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情事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②何况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及传媒技术的飞速进步，人民的政治意识、政治能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完全不同。在传统的政治中介之外，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参政权利和直接的发声机会。合法和平的游行示威，当然是表达意愿的正常渠道，是代议制民主机制的一部分。被米歇尔斯认为是限制寡头倾向有力措施的公民投票如果能降低门槛，自然也是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新途径。

总之，法国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防范民粹主义，而是政治精英如何承担好自己的政治功能。

^① 20世纪80—90年代，法国电视二台有一个收视率颇高的政治搞笑节目“雄鸡公子”(Cocoricoboy)，将所有当时的政治家都打扮成动物布偶，然后大放厥词，引观众哄笑。在这种“解构”的环境下，魅力型领袖正不易再次出现。

^② [英]密尔：《论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

对第二个问题,即错误的群众运动构成了民粹主义,答案会简单得多。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民粹主义的标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民粹主义的所指应当是平民大规模地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在法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这似乎不应笼统否定,因为这就是民主的真意。所以,人们批评的大约是引起各种不良后果的“错误的”民粹主义。但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好的民众参与就是民主,“不好”的民众参与就是民粹。何况一旦涉及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评价就取决于立场而很难一致。法国人一向以大革命自豪。1848年革命、“五月风暴”所收获的也基本是赞颂。然而,这些伟大的革命与“黄马甲运动”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硬要找的话,便在于它们都比后者暴烈得多。所以,我们是基于性质、基于后果、还是基于形式来批评民粹主义?

第三个问题即民意本身便意味着民粹主义,看似给人以时空错乱的感觉,其实需要认真对待。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权力,不只是民享,还包括民有和民治。民主的本义就是人民有资格、有能力平等地参与政治,否则,为什么要视民意为权力的来源?代议制民主只是民主在现代的一种实践方式、操作程序而已,没有人规定民意只有这一种表达途径、表达方式。特别是我们不能抽象肯定民主而具体否定人民,或抽象肯定人民而具体否定大多数人。人民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民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幻相,而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否则,民主到底是什么呢?

不顾民主的含义而去简单笼统地批评民粹主义,实际上反映的经常是精英对民众的轻蔑,认为民众没有能力、不够理性、容易上当——不听我的必定上当。公投是法国的宪法程序,那么,是否某提案通过了就是民主,没有通过就是民粹?各级选举是法国政府合法性的基石,那么,是否A候选人当选就是民主,B候选人当选就是民粹?政党的地位与作用在法国宪法中已有规定,那么,是否A党得票多就是民主,B党得票多就是民粹?这些不都是在现行制度下的正常政治运作吗?多数原则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人们为何如此不在意规则和程序的权威性,如此不相信人民的眼光与智慧呢?我们应当认识到,并不是只有得到精英认可的才不是民粹;也不应以批评民粹主义的借口批评法国民主。口头上的“民主主义者”经常有叶公好龙的心态,顺应民主的潮流而将精英制披上民主的外套。但一旦民众真的有所动作,便立刻诋为民粹主义。

在总体上,法国政治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当然仍是精英政治。所谓民主

因素，只是赋予平民一定的博弈手段，用来有限地平衡精英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权的上升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胜利，因为行政权不可能民主化。司法权也是精英的禁脔。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民粹主义，可能是典型的站在权力一边的右翼思维，是对法国人民几百年来斗争成果的嘲笑。人们在批评民粹主义的同时，也应当警惕法国政治中的寡头化危险，警惕“精粹主义”倾向。即使在代议制民主运行良好的时候，它的精英主义弊病也仍然存在，也要拓宽平民意志的表达渠道。而在政治中介团体失灵时，真实民意的反映受阻，政治精英化的倾向加剧，便更应着重设计其他的向平民倾斜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黄马甲运动”及其中的若干政治口号，具有相当的想象力，未始不会给民主制度的发展带来启示。

记得 1989 年冬，笔者在法国与几个同学一起聊天。大家都同意福山的判断，认为民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的导师听了几句后，笑我们缺少最起码的历史感(*le sens de l'histoire*)，即不知道任何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是一个过程，并不存在永恒，也谈不上什么方向。30 年后回想起这一幕，深感先生的睿智。

历史是螺旋还是钟摆？300 年前，民主思想从绝对主义的包围中破土而出。200 年前，民主实践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登上政治舞台。从这时开始，它一直呈现缓慢而持续的上升态势直至冷战结束。现在看来，也许那时正是民主主义的顶点。表面上大势已成，沛然不能御。但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民众与精英谁又能取得一劳永逸的胜利，又能声称某一种政体形式终结了历史？民主的精神即民主主义的风行，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咸与民主，但其实际政治泰半仍维持在精英制的轨道内运行。曾几何时，民主主义本尊似乎也有跌下神坛之势，不复福山预言的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人们近年来很容易观察到“疑民主论”的悄然兴起，对民粹主义不加分析的盲目声讨似乎便是一例。在这种形势下，与潮流保持一段距离，不忘中道平衡的古老智慧，仍然应该是一个思想者的选择。